

教學語言：小心解讀研究結果

教學語言爭論了近 30 年，從來未有萬全方案。近日一些議會建議容許中中用英文教授某些科目。因為家長從來就希望多一些英文授課，所以他們好像也頗為滿意。

不過公眾對各項建議具體實施方法及其弊端，所作的深入討論並不算多。在這議題中，頗多人也引述一些經驗及研究去支持其觀點及建議，但是小規模研究難以推論到其他情境，而大型研究亦有甚多局限。

進行嚴謹的教育研究從來不容易，教學語言研究也不例外。道德上我們難以在違反父母意願下，隨機（攪珠）將學生安排到中中或英中就讀，令實驗組（如：用英文教學）與控制組（用中文教學），有相同起點能力，以進行一些與自然科學般的實驗研究。此外安排學生接受一兩節，甚至一兩個月，短期用英文或中文的教學，對他們的學習效果影響輕微，也不足以推論全面用英語教學的優劣。

小量錯配學生數據不能作推論

我們曾與牛津大學馬殊教授，共同在《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發表報告，我們追蹤在英中及中中學生的多年成績發展，比較他們的學業等增值，以了解英文還是中文是更好的教學語言。不過，自 1998 年強制教學語言政策實施後，這類研究方法的局限極為明顯。

因為成績較好的學生大部分就讀英中，要找出能力相近，但分別就讀於中中及英中的學生，追蹤他們的成績，以比較以英文還是中文教學更好，甚為困難。因為這類能力相近，可用作分析比較的，只剩下極少數能力較弱被「錯派」到英中，及極少數能力較佳「錯派」到中中的學生。基於這少數學生的表現，去推論全港學生的可能表現，甚為危險。

退一步來說，勉強接受這類報告，也只能說中上能力學生接受某種教學語言更佳，以此認定能力更差的中中學生，會有相同程度的好處，是錯誤的推論。一些能力很低的學生，不可能升讀中六，遑論升大學，他們也誤以為用了英文教學，不單語文，其他學科成績也會躍進，升大學機會就算不能上升數倍，也有明顯進步，這是美麗的誤會。

簡單而言，我們不能依這類分析中上能力學生的結果，推論其他能力更差學生應該用的教學語言。

舉一例子以說明上述的錯誤推論，假設我們希望了解美國及中國人吃米飯還是牛扒更好，最好的方法，當然是比較大量在美國吃米飯及牛扒的人，以及在中國吃米飯及牛扒的人。我們發覺美國人絕大部分吃牛扒，而中國人則大部分吃米飯。我們只能勉強在美國的唐人街找到少數吃米飯的華人，及在北京見到少數吃牛扒的美國遊客。顯而易見，基於這少數唐人街的華人及北京的遊客的任何結果，都不能推論出米飯還是牛扒更適合其他中國或美國人。

一些人或許認為我們只需用統計方法，將能力較高的英中學生，調校至與能力較差的中中學生可以比較為止。在一些能力差異較少及分佈較平均的研究課題，用統計方法去作調整確實常見，但自 1998 年強制教學語言實施後，英中、中中學生能力明顯差異甚大，用增值等統計方法，去了解中中還是英中增值更多，最明顯易明的問題，是錯誤假設英文教學，對能力不同的學生，有相同的效果。

合理的推想，一些能力較高學生，用英文教學，無損他們學習非語文學科，但對能力較差的學生，若用英文教學，會令學習難上加難。所以在這個課題，用 1998 年的數據作分析，並作統計的調校，要極小心去解釋所得的結果。在一些嚴重的情況，此種研究結果甚至可以呈現虛假的相反結果（如：中中教學效果更佳，會錯誤地呈現為英中教學效果更佳）。在真實的世界及數據中，我們往往難以了解我們的結果有多大的錯誤。

困局：父母怎樣犧牲也要英文

最後無論上述研究如何科學準確，還有最難解決的問題——父母的態度。就算研究顯示母語教育對能力較差的學童更有助於學習不同的學科，就算課堂外比課堂內的語文環境對學生掌握日用英語的能力更具影響，但只要父母認為進了英中或用英語授課，英文自然好，那麼對他們來說，「就算犧牲 30 分科學等知識，去換取 1 分的英文進步（輸了間廠換粒糖），也是值得的」。任何教學語言的研究都立刻變得無力及無意義，因為研究結果無法影響父母對英語的重視程度。不同學科的「幣值」差異甚大，實非一般教學語言研究可處理的課題。

最後但願公眾明白，在數十年的教學語言爭論中，從來沒有多方均贏的解決方法，只有最少傷害的妥協方案。毋庸置疑，讓學校專業自主決定教學語言，極富吸引力，

但我們應詳盡討論現實考慮和實施細節（如收生、編班等），及其可能對學生學習及學校生態所引起的負面後果。

作者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講座教授